

# 知识的价值与高等教育哲学

##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读书报告

刘志文

**摘要:** 作者认为,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哲学及其演变分析中,较多注意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等外部因素,较少关注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的变化,忽视了导致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内部因素。为此,作者提出建立知识价值视角,并探讨了知识的价值、知识的发展、知识的研究与传播等对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影响。

**关键词:** 知识价值;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4)04-0021-03

##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Liu Zhiwen

**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Bruberck lays particular stress on exterior reasons such as politic,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when discussing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He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values of knowledge, and ignores the inner reasons for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o, the author advances to establish a view of knowledge value, and analyses the aspects affecting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the value of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spread of knowledge.

**Key words:** the value of knowledg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Bruberck

### 一、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

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因此,“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围绕着高深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思想及其演变,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例如,第一章重点分析高深学问合法存在的场所——学院和大学的职能及其演变;第二章重点分析高深学问研究和传授的主体——专家和教授的权力(学术自治);第三章重点分析高深学问的组织形式——学术活动的特点(学术自由);第四章重点分析高深学问的服务对象——学生的权利(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第五章重点分析高深学问的内容的选择(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等等。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在上述各章中都分别存在,由此形成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贝克在论述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力量的对比和演变时,比较关注的是外部的因素,即社会力量的影响,而比较少从内部的因素,即高深学问(知识)自身的价值和功能发展对高等教育哲学演变所产生的影响。这样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局限和不足:

1. 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强化了政治论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发展因素的影响,弱化了认识论的价值。

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学校存在的合法基础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赖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这种观念是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而殖民地时代又是从欧洲继承下来的。”“随着像德国大学一样重视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根据。”“贯穿十九世纪的不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赋予学院和大学发现知识以越来越现实的影响。

\* 收稿日期: 2004-03-24

作者简介: 刘志文(1972-),男,江西余干人,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研究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厦门,361005。

……结果，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从这种历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主要是从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化来论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鲁贝克后来提到的“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论。而很难从其中看出认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又比如，布鲁贝克在论述“学术自治”时，把经费是否独立看成是影响大学能否自治的主要原因。认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完全的自治要求完全的经费独立。这种程度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认为外在的力量会战胜内在的力量，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从而弱化了学术自治内在合理性的价值。

2. 偏重描述性地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化过程，以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合理性，也无法对未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变趋势进行有效预测。

布鲁贝克在导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学变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行动，集中抨击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布鲁贝克认为导致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的需要。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事实上，这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哲学演化过程的论述，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变化之上。那么，除了社会需求所代表的外部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影响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因素呢？我认为应该还有内部的因素和规律，这个因素和规律就是高深知识的价值和功能自身的演变。

3. 布鲁贝克将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的哲学基础，预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是认识论和政治论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否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只有一个中心（认识论的或政治论的），还是两个中心（认识论和政治论并存）？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布鲁贝克论述高深学问时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认为“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高等教育的目的”，“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强调政治论的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在论述学术自治时，指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认为认识论的哲学与学术自治更合拍。而从政治的观点看，学术自治是有限度的，“就像战争意义

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其它几个方面的论述也是如此，似乎认识论与政治论是二元的，而且必然是矛盾的。但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又都是合理的、共存的，这可以很容易地从全书的论述中看出，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又为什么是可能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知识的价值和功能发展才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 二、知识价值视角的建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归结于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即缺乏对高深学问也就是高深知识本身的变化探讨。因此有必要重新建立知识价值视角，探讨知识的价值和功能及其演变对高等教育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哲学的变化和发展。从知识价值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发现：

1. 高深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知识具有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产生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

布鲁贝克在谈到认识论哲学时，认为“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自由并不是产生高深学问客观性的前提条件，相反，应该说客观性是高深知识的本质特性，正是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教授在学术活动中遵循价值自由的原则。这一点不仅在传统的大学适用，而且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大学。正因为高深学问在追求真理和客观性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这种知识即使不应用于社会现实也具有意义，所以说“追求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产生的基础。

虽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和客观性本身具有认识价值，但不能否认高深学问还具有应用价值。正如布鲁贝克指出的，高深学问为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解决现实中各种问题提供了可能。知识的应用价值要求学院和大学通过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甚至直接提供解决办法来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产生的基础。

2. 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决定了知识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认识价值要求知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应用价值要求知识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因此，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能由一种哲学代替另一种哲学，也不能由一种哲学统治另一种哲学。

知识的认识价值不具备控制社会现实的基础，相反，它要求知识在追求真理和客观性时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免受现实领域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它要求知识的发展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道路。这种知识不像工艺知识、技术知识等具有应用价值的知识一样经受成功或失败的实际检验。它唯一必须经受的检验就是被社会生活中

的人接受或拒斥。这种接受或拒斥，直接依赖于那些人对真理规范标准的态度。如果他们承认这种规范标准，他们就相信这些知识是真的，因为他们希望它是真的；如果不承认，他们就相信这些知识是假的，因为他们希望它是假的。高深学问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特点，直接影响着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和价值。所以迈诺格坚持认为，“学术远离现实并非专制时代下的遗风，而是学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政治论哲学盛行，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影响和介入大学的当今社会，大学的教授和学者依然要保持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应用价值因为两方面因素而得到加强，一是知识因为分化而形成不同的知识系统，“知识爆炸”式的发展，使人们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每一个知识系统都发展为特定的应用领域。二是知识成为扮演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人们不可能再依靠经验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必须参与到特定知识系统，才能成为某些群体的成员，扮演一定的角色，此类群体不允许有“无知者”。因此社会要求大学除了承担纯粹认识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研究之外，还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任务，甚至于直接参与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大学职能的变化只是增加了影响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传播的力量，并不是否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治的价值，更不是否定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3. 学院和大学既承担知识研究职能，又承担知识传播职能，大学教授既有知识研究的任务，又有知识传播任务。双重功能和双重任务的价值冲突，导致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冲突和矛盾。

布鲁贝克多次论及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冲突，但都偏重于从社会的因素来分析。例如，在第一章中以“哲学的冲突”为题论述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哲学冲突。认为“最初，教授被认为在政界和学界都有公民身份。当时，这种双重公民身份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矛盾。”“然而，到十九世纪末，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两个政体间的和谐关系变为紧张状态。由于教授变为政府和企业大亨的仆人，因此他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教授不再是为民主社会服务的社会改革家，而成为为民主国家服务的改革家”。教授难以保持价值自由，于是产生了哲学冲突。这种从教授社会地位的变化分析，只是高等教育哲学冲突的外部原因。不能看到大学知识研究职能和知识传播职能，以及教授从事知识研究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冲突。这种无意识的忽视，很容易导致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是不可协调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大学的政治化必然导致“学术的贬值”；一方面又认为，“经验而不是逻辑”才是高等教育的生命，因此“不能完全墨守在大学的逻辑范围内”。

事实上，从大学学术活动的内部来看，双重职能和双重任务的价值冲突至少可以部分地协调和平衡，从而达到两种哲学的共存。平衡冲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把不同职能的活动适当分离。高深学问的研究主要采用认识论的哲学，保持价值中立，而知识的传播和服务则可采取政治论的哲学，适应社会需要进行价值选择。二是不同任务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也可以避免价值和哲学上的冲突。在较老的学派中，知识的传播者往往委派给尚未获得高水平学术的人担任，或永久委派给那些无望对学术知识增加提供意义的人担任。在现代社会，今天知识传播者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目前它的数量已经是从事科学生产的学者数量的几倍。这种角色分化有效地降低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的矛盾。

4. 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促进了知识分化，科学知识和应用性职业知识的价值都得到强化，这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服务对象的变化，也引起人们对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重视。

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时，主要从权利与特权的分析入手，探讨高等教育应该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服务。并从人们关于公平和平等的看法中，探讨高等教育是应该选择大众型还是英才型高等教育模式。这虽然可以用来解释美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长的原因，但并不能解释其它强调集权和非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大量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人们对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视，使科学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价值都得到了强化。特别是专业知识在职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掌握专业知识成为人们进入社会的必要条件，这就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服务对象的扩大。

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上，虽然自由教育最初是“自由人”的教育，是一种上层社会的特权，但自由教育的追求理性发展理智美德的特点并不是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同样，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并非平民阶级才需要。“自由教育的思想最初是在前技术时代形成的，那时各行业主要依靠经验的方法行事”。然而，现代社会“工作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些职业中有许多职业已渗入了这种理论成份，而这种理论成份给这些职业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以一种新的理智上体面可敬的地位”。由此可见，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裂，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劳动分工的割裂造成的，而不是知识的本身要求。因此大学既应该重视普通教育也应该重视专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

(责任编辑 曾山金)